

## 8

## 長安城與唐代多元文化

長安位於關中地區<sup>1</sup>，是西漢、隋<sup>2</sup>、唐等十三朝的都城。618年，唐高祖將「大興」易名為「長安」，取其長久安定之意，設首都於此，寄語對國家發展的期盼<sup>3</sup>。

開放多元是大唐文化的代名詞，而長安作為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其寺廟林立，外國旅客絡繹不絕，市場交易頻繁，更是完美闡述了唐朝的氣質。故此我們不妨以首都長安作為切入點，並以宋人呂大防的《長安圖》剖析其城市結構，從宗教和商貿兩個層面，感受唐文化的多元色彩，繼而以文物〈蘇諒妻馬氏墓誌〉為例，分析中外文化融合交流的情況。

## 長安的城市佈局

據統計，長安的人口高達一百萬<sup>4</sup>，佔地84平方公里<sup>5</sup>，或是當時世界上最高人口的聚居地。長安的城市佈局與隋大興城大致相同，不過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唐代君主也作出相應的擴建，並新建大明宮。

我們現在對長安古城的認識來自呂大防的《長安圖》<sup>6</sup>及其他文獻。現代考古學家以呂大防的繪畫重現唐長安城的面貌，研究出長安城方正對稱，印證了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的說法。以下將輔以經修復的《長安圖》解說長安城方正、對稱的特色：

<sup>1</sup> 大概是現今西安一帶，但唐代的長安城規模遠大於現代的西安

<sup>2</sup> 名為大興

<sup>3</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頁15

<sup>4</sup>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臺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90

<sup>5</sup> 龔國強：〈再現輝煌隋唐長安城遺址考古精粹〉，《大眾考古》，2019年12期，頁21

<sup>6</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7；李健超：《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291；「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一書的記載，《長安圖》，元豐三年正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波都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跡」



[宋] 呂大防《長安圖》復原圖

## 為甚麼說長安城「方正」？

長安城分為三重，宮城是皇廷所在地；皇城則為百官之所；外廓城是一般貴族和平民的居所及活動之所<sup>7</sup>。城市四面由夯（音：坑）土城牆圍繞，清楚標明城市的範圍，在不同方向設木城門由士兵守衛<sup>8</sup>，防衛森嚴。長安城以里坊制度劃分區域，一個方形的城市被劃分成108坊，東屬萬年縣，有54坊；西屬長安縣，有54坊<sup>9</sup>，每一坊四面都有牆圍繞<sup>10</sup>。

<sup>7</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2000年03期，頁63

<sup>8</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3

<sup>9</sup>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年02期，頁83指出長安有109坊，東有54坊，西有55坊；但實際上里坊的數目有波動，此處取108坊為數，是因為此數較普遍。來源出自龔國強：〈再現輝煌隋唐長安城遺址考古精粹〉，頁20的考察：「里坊數先後略有變化，唐初置時為108坊，後因大明宮新建，其南里坊分割而旋增為109坊，至開元十四年（726年），因興慶宮擴建又成108坊，遂成定制」；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則明確提出東西里坊的數目均為54

<sup>10</sup>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頁84

## 為甚麼說長安「對稱」？

長安城東西結構對稱，各司其職。城內以要道朱雀大街分割東西，兩個市場因為方位不同，被稱為「東市」和「西市」。東邊人口較多，發展地方較少，屬於平民住宅區，最下方有一曲江芙蓉池，不過並非公眾開放場所，只有高中進士才有參加「曲江大會」<sup>11</sup>的資格；西邊則有較多地方，貼近絲綢之路，中間有售賣貴價貨品的西市，西市附近有不少胡寺，是繁華的商貿文化地帶。

## 長安的城市管理怎樣？

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必須有嚴格的指引，以維持秩序，長安的宵禁制度就是一例。六街各設街鼓，鼓聲響起，城門、坊門就要關閉<sup>12</sup>，夜間禁止出入<sup>13</sup>。直至早晨再次敲鼓，城門才會再次打開<sup>14</sup>。城市設左右街使夜晚巡邏<sup>15</sup>，如發現犯夜者，則用鞭或竹板打其身體二十下以作懲罰<sup>16</sup>；越坊市垣籬者，則杖七十<sup>17</sup>。遇到緊急事務或婚嫁喪病等特殊情況必須夜行，就應持官府或本坊文牒，經檢查後才能夜出坊門<sup>18</sup>。

## 我們能從長安的佈局和城市管理得出甚麼訊息呢？

長安城方正對稱，毫無疑問是出於精心規劃。如此精心的設計使城市井然有條，內外交通便利，促進了中外的文化交流，是長安繁盛的必要條件。

從另一角度來看，長安城的佈局也有維護皇權的目的。長安如一個圍城，城的外圍、里坊都有夯土護牆圍繞，既隔絕外來威脅，又明確控制居民的活動範圍；六街的終點是不同方位的城門，設常駐守衛，即使城內有動亂也能夠快速到達。城市的硬件配套不但有保護的作用，更具一定的監察功能。配合宵禁措施和嚴謹的《唐律》，就可確保城市秩序的穩定。唐文化雖然多元，但我們也可以從城市的管理窺見政府對人民的嚴格控制。

<sup>11</sup> 曲江大會為新科進士的集宴，也是身份的象徵

<sup>12</sup> 肖愛玲、周震：〈唐長安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月41卷01期，頁68引趙貞《唐代長安城街鼓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一文指出宮城、皇城城門在五更一點開啟，按現在時間推算應為凌晨3:24；日入前五刻閉門，即17:48。京城（外郭）門四更一點開門，相當於凌晨1:40分。對於外郭的開門時間兩者有不同看法，趙貞按日入前十四刻閉門，推算時間大概在15:38；而肖愛玲及周震則認為外郭門的關閉時間要更晚，應在17:48後

<sup>13</sup> 肖愛玲、周震：〈唐長安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3

<sup>14</sup> 同上註，頁67

<sup>15</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57引《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

<sup>16</sup> 肖愛玲、周震：〈唐長安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7引《唐律疏議》：「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違者，笞二十」

<sup>17</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57

<sup>18</sup> 肖愛玲、周震：〈唐長安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7-68

## 從不同面向看唐的多元文化

上文勾勒出長安城的具體形象，以下將分別介紹長安城的特點，證明其如何達致文化的開放及多元：

### （一）交通便利，水陸皆宜

交通便利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長安四通八達，有利文化和商業交流。長安城有精心的城市設計，這點可見於城內的六條主要道路——「六街」<sup>19</sup>，每條街都通往城門，東西相連、南北互通，陸路四通八達，方便其他地方人士來訪：

1. 開遠門街至通化門街<sup>20</sup>
2. 金光門街至春明門街<sup>21</sup>
3. 延平門街至延興門街<sup>22</sup>
4. 安化門街至芳林門街<sup>23</sup>
5. 明德門街至朱雀門街<sup>24</sup>
6. 啟夏門街至興安門街<sup>25</sup>

此外，長安被渭水、涇水、灃水、澆水、灃水等八條河流環繞<sup>26</sup>，便於排水和灌溉<sup>27</sup>，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先天優勢。自隋代開始挖掘大運河，唐繼續這個工程，構建成完善的水路網絡。配合運河系統，日本、朝鮮、印度、波斯、大食等各地商旅都能輕易以水陸兩路到訪長安城<sup>28</sup>。

文獻顯示有不少外國人在長安進行文化商貿交易，並在此常駐生活，甚至成為唐朝官員<sup>29</sup>。長安的商業蓬勃發展，而非法勾當之事亦時有出現，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胡商遇盜圖》便清晰描畫了三個漢人盜賊伏擊胡商團隊的情況。

<sup>19</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3

<sup>20</sup>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頁104

<sup>21</sup> 同上註

<sup>22</sup> 同上註

<sup>23</sup> 同上註

<sup>24</sup> 同上註

<sup>25</sup> 同上註

<sup>26</sup> 王才強：《漢唐長安》，《絲綢之路》，2017年05期，頁63

<sup>27</sup>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5

<sup>28</sup>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02期，頁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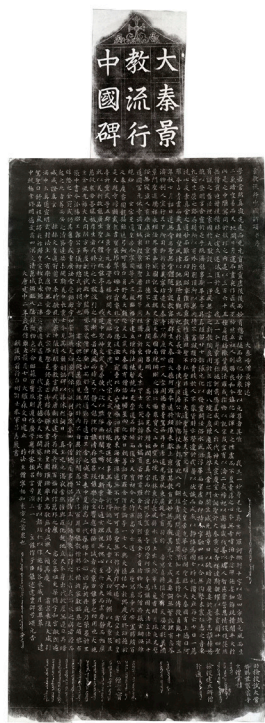
<sup>29</sup> 同上註，指出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衡，也作朝衡）曾在唐王朝任秘書監、散騎常侍等職；印度人羅好心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

## (二) 廟宇繁多，百花齊放

長安是文化之都，這可體現在林林總總的寺觀建設，不同的宗教在此紮根，合共有151所宗教場所。著名的寺廟要數大慈恩寺，乃是長安四大譯經場之一，玄奘法師在此潛心翻譯佛經十餘年，佛教歷史遺蹟大雁塔也位於寺中。除此之外，長安的宗教也別具異域色彩，景教自唐代傳入中國，長安城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向我們交代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情況。寺廟的具體例子及種類可參考後文「長安城宗教列表」。



大雁塔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大秦寺景教碑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 為甚麼長安城廟宇眾多？

廟宇的作用不僅於供奉神明，還有其他附加價值。它們既是宗教場所，也是旅館。據統計，唐國子監收各州府學生，最高時期有八千留學生<sup>30</sup>，面對如此多的外來人口，廟宇就成為了商人、士子住宿、修業的臨時居

<sup>30</sup>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頁86

所<sup>31</sup>。寺院風景優美，庭院清幽，同時也是文人騷客聯誼之地，有賞花、賞月的雅致活動<sup>32</sup>，不少唐代文學作品都有提及。

長安的寺觀多建在里坊一隅，方便宗教活動<sup>33</sup>。108坊過半數都有涵蓋宗教網絡<sup>34</sup>，多數寺觀分佈在外廓北部，即長安的中心區，貼近宮城、皇城的核心區及兩市的中心商業區，是居民集中的熱鬧繁華之地<sup>35</sup>。下表就此作簡介：

### 長安城宗教列表<sup>36</sup>

	數目	宗教	例子
僧寺 (男)	81	佛教	大慈恩寺(大雁塔)、 薦福寺(小雁塔)、大興善寺 <sup>37</sup>
尼寺 (女)	28	佛教	龍華尼寺、法明尼寺、 昭成尼寺等
道觀 (男女)	30	道教	玄都觀 <sup>38</sup> 、玄真觀、華陽觀等
女觀 (女)	6	道教	金仙觀、玉真觀 <sup>39</sup> 等
胡祆祠	4	拜火教	分別位於布政坊、義寧坊、 醴泉坊及崇仁坊 <sup>40</sup>
波斯觀	2	景教	位於醴泉坊、義寧坊有大秦寺 <sup>41</sup>

<sup>31</sup> 李芳民：〈唐都長安的道觀與詩人的詩歌創作〉，《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05期，引杜光庭《神仙感遇傳》：「進士王璠，因投旅館住宿不成，遂入豐邑坊景雲觀租一獨院居住，每月五百文即「稅耒耜焉」；裴鏞《傳奇·許棣岩》亦載許棣岩舉進士時「習業於昊天觀」

<sup>32</sup> 同上註

<sup>33</sup>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臺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87

<sup>34</sup>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頁119指出109坊中有77坊設寺觀

<sup>35</sup> 同上註

<sup>36</sup>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86，引[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

<sup>37</sup> 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24

<sup>38</sup> 劉禹錫賦詩兩首於此觀，詩中的劉郎是指劉禹錫本人，從詩中可見詩人在玄都觀賞桃會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再遊玄都觀〉：「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sup>39</sup> 《唐會要》卷50：「金仙觀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立為觀。至二年四月十四日。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玉真觀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實誕宅。武后時為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第九女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觀便以玉真為名」

<sup>40</sup>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06期，頁418

<sup>41</sup>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 長安城的寺廟可反映唐文化的甚麼特點？

長安城宗教百花齊放，體現了唐的開放多元文化內涵。

### 種族共融

從上表可見，長安城同時存在多種宗教。佛教是唐代的一大宗教，故佛寺數量最多。但佛教是外來宗教，早在漢代已經從印度傳入。唐皇族姓李，並自稱為老子後人，故道教成為唐朝的國教，而長安城的道觀數目亦甚多。除了在中國紮根的佛教及本土的道教，西亞、中亞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等不同教派也在長安設立宗教場所，雖然數目不及佛寺和道觀，但也可以體現對少數宗教的包容。

有如此數目龐大的宗教建築及多元的宗教文化，反映了長安城對外交流的頻繁，不同種族紛紛到來，雖然彼此的信仰不同，但卻能在這片土地共存共處。

### 性別階級平等

一般而言，宗教的性質是樹立一個大同社會，導人向善，追求精神的圓滿。故此，要使不同宗教能有所發展，先要盡量移除不平等因素，比如性別及階級的差異。長安的寺觀設計充分考慮不同性別的宗教需要，既有專門為男性而設的僧寺，也有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場地，如尼寺和女觀；甚或男女共用同一地方，諸如道觀。證據甚至顯示女性道教信徒的數量曾一度超越男性信徒<sup>42</sup>，反映了不論是何性別，在唐長安城都享有宗教自由，社會性別相對平等。

另一方面，無論是唐貴族皇室人員還是平民都有投身宗教的權利。女觀的建造乃公主出家修行的居所，比如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因而建金仙觀；與金仙觀相對的玉真觀便是為昌隆公主而建<sup>43</sup>。另一方面，普通女性如果要修行，可選擇進入女觀，或投入尼寺、道觀。所以，不論出身在皇家還是平民家庭，都同樣有投身宗教的自由。

## (三)東西二市，絡繹不絕

從古籍可見，長安有不少外來人口，他們在此進行文化貿易交流，有些甚至在此居住。長安城有兩個市場：東市和西市，分別位於朱雀大街左右。

### 東市

研究指出西安交通大學校園有部分是東市遺址，其南北長1000餘米，東西寬900餘米，街道呈井字形，比西市的街道寬一倍<sup>44</sup>。[宋]宋敏求《長安志》有「公卿以下民止多於朱雀街東」<sup>45</sup>的記載，可見東邊是長安的平民區。人口密集必然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甚大，古書所記東市有220個行業<sup>46</sup>，涵蓋食物、日用品、消閒、零售、服務等<sup>47</sup>。

### 西市與絲綢之路

東市人口密集，並無地方作倉庫存貨，商人轉而投向西市；西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外國商人到達長安之後最貼近西市，所以他們便在此交易。故此，西市較東市繁華，有更多奇珍異寶<sup>48</sup>。

商人中又以波斯人、大食人、粟特人<sup>49</sup>最多，他們被稱為「胡人」<sup>50</sup>，其中波斯人擅長鑑定玉石，故多經營玉石、珠寶業<sup>51</sup>；而粟特人則是商業民族<sup>52</sup>，他們多住在長安城西部，經營店鋪也多在西市。西市的南大街中部，出現似是珠寶店的遺址，有許多骨器、珍珠、瑪瑙、骰子等物<sup>53</sup>。骰子是中亞大陸當時流行的玩具，西市商人將骰子與珠寶一同售賣，引人聯想此貨乃出於胡人<sup>54</sup>。

因為大量胡人流連長安，唐代的藝術品——「唐三彩」<sup>55</sup>便有大量與胡人相關的題材，常見的有釉陶馬、牽馬胡人俑及胡樂師騎駱駝陶俑等瓷器造型。除此之外，波斯銀幣、羅馬金幣、阿拉伯銀幣以及波斯人〈蘇諒妻馬氏墓誌〉等文物也出土在西安西郊或西南郊<sup>56</sup>，印證了以上的說法。

<sup>44</sup>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頁125

<sup>45</sup> 《長安志》卷八

<sup>46</sup> 《長安志》卷八：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

<sup>47</sup>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96-97

<sup>48</sup> 于廣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第二講隋唐人的城市生活（二），頁39

<sup>49</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

<sup>50</sup>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sup>51</sup> 同上註

<sup>52</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

<sup>53</sup>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18

<sup>54</sup> 同上註

<sup>55</sup> 泛指唐代的彩陶，主要以黃、綠、褐（或綠、赭、藍）三色為主，所以稱之為「唐三彩」

<sup>56</sup>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sup>42</sup> 李炳武：《長安學叢書·宗教卷》（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頁56引《新唐書·百官志》：開元24年，道士776，女冠988

<sup>43</sup> 《唐會要》卷50



唐三彩駝和外域商賈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 甚麼是〈蘇諒妻馬氏墓誌〉？

墓誌銘是死者親屬為紀念死者而刻的碑文，一般放在墳墓上方，予人辨識身份。在眾多挖掘的文物中，最能反映中外文化交融的文物要數〈蘇諒妻馬氏墓誌〉<sup>57</sup>。該墓誌銘文的特點是雙語寫作，上半刻中古波斯婆羅鉢文，下半為漢字銘文<sup>58</sup>。

漢字誌文：

左神策軍散兵／馬使蘇諒妻馬／氏己巳生年廿六／於咸通十五年甲午／午  
口<sup>59</sup>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時身／亡故記<sup>60</sup>

<sup>57</sup>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璧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考古》，1964年09期，頁458：「誌石為白色石灰石，略呈方形，寬39.5、高35.5、厚7厘米，無蓋。誌面刻有兩種誌文，下半為漢字，7行，每行6字至8字不等，最後一行為3字，共41字。漢字的字劃因為刻得韌而淺，有的字不甚清楚。石作也不甚精緻……僅正面因刻此文」

<sup>58</sup> 同上註

<sup>59</sup> 缺一字

<sup>60</sup>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璧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58。漢字銘文大意：第一及第二行交代了立誌人名叫蘇諒，在唐擔任左神策軍的職位。死者是他的妻子，曰馬氏。馬氏死亡時只有26歲，丈夫便為她立碑紀念

中古婆羅鉢文：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蘇諒家族之左神策騎兵之長的女兒馬昔師，於已故伊嗣俟240年，及唐朝之260年，常勝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陽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於廿六歲死去願其住地與阿胡拉·馬茲達及天使們同在極美好的天堂裡，祝福。<sup>61</sup>

墓誌銘的內容：

漢字銘文寫蘇諒的職位左神策軍散兵馬使，學者考察是787年時唐室授與留居長安的西域各國王子、使者的武職<sup>62</sup>，故蘇諒應為胡人。死者馬氏在849年生<sup>63</sup>，卒於874年<sup>64</sup>，虛歲26<sup>65</sup>。漢字銘文只為我們提供蘇諒在唐任職、死者名曰馬氏、馬氏生卒時間這三個有限信息。

由於兩者是外國人，我們不能單靠漢字銘文理解當中的文化，故此需要閱讀更詳細的原文墓誌銘。以中國傳統來看，蘇是姓，諒為名；馬氏，意為馬家的女兒，馬是父親家族的姓氏；婆羅鉢文墓誌顯示蘇諒乃是家族名，而不是本名，更要補充的是他是波斯王族之後。有關馬氏的身份，外文譯文與漢字銘文內容有差異，死者馬氏與蘇諒的關係是父女而非夫婦。外文的墓誌在收結時也增加了宗教色彩，為死者祈求祆（音：牽）教主神阿胡拉·馬茲達和天使的庇佑，這說明蘇諒及馬氏都是祆教信徒<sup>66</sup>，這是漢字銘文所沒有提到的。

〈蘇諒妻馬氏墓誌〉如何反映長安文化的多元？

1. 立誌人蘇諒和妻子都是波斯人，但他們有漢字姓名。蘇諒甚至在唐政府擔任官職，可見唐室對外國人的重視。
2. 蘇諒在長安任職，所以他和亡者生前應該常居於此，而亡者死後又埋葬在長安，顯示有外國人在長安定居，並以此為家。
3. 刻寫墓誌是中國傳統，而且該誌也是以典型的中國風格寫成：先交代死者與立誌者的關係，然後簡單交代其生卒，最後以立誌懷念短句作結。

<sup>61</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9-70

<sup>62</sup>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璧墓誌——25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60，指出787年為唐德宗貞元三年，留居長安的西域各國王子及使者授武職的官銜為左右神策軍散兵馬使

<sup>63</sup> 唐宣宗大中三年

<sup>64</sup>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sup>65</sup>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璧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61

<sup>66</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70

4. 墓誌為雙語寫作，包括漢字與中古波斯的婆羅鉢文，反映中西文化的融合。

除了馬氏墓誌外，還有不少胡人選擇在長安設墓<sup>67</sup>，可見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受漢化，且推崇唐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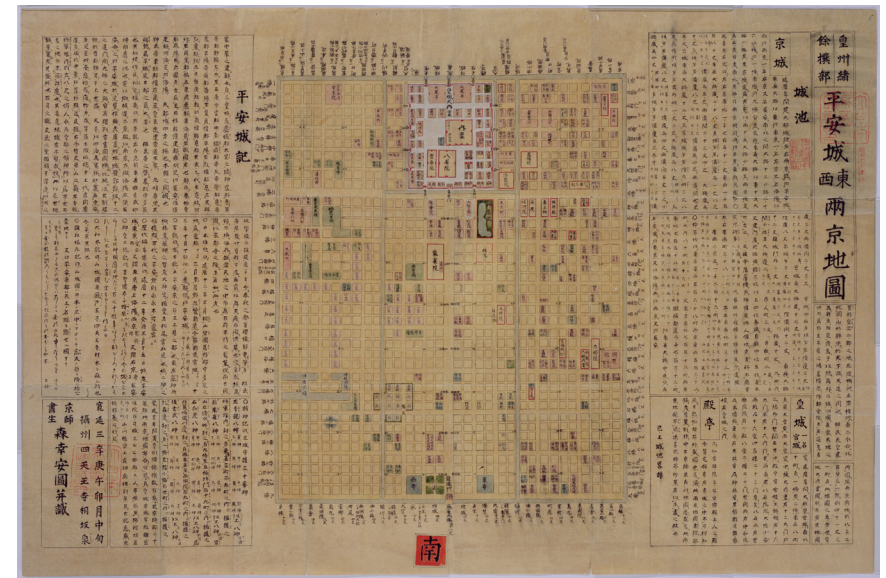
## 長安佈局模式的影響

長安城的建築風格對不同地區的城市建設影響深遠，唐代東北的渤海國及日本京城的设计大體參考長安模式。「上京殘磚」出土於渤海國五京之一的上京，即今黑龍江寧安縣的東京城龍泉府城遺址。學者考究上京的整體構造仿如長安，有外廓、皇城和宮城三層，其宮城亦居於北部正中<sup>68</sup>。



上京殘磚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此外，日本也極力吸收隋唐文化，打造出仿長安或洛陽的都城<sup>69</sup>。藤原京、難波京、平成京、長岡京及平安京，均採宮城居於北部正中的佈局，設朱雀大街於都城正中<sup>70</sup>。可見長安佈局模式的影響之廣。



平安京復原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 總結

綜合以上所舉在宗教、商業、文化層面上的胡漢交流，均建基於唐皇室對外的開放態度。唐室主動招攬外來人口入唐，唐太宗在貞觀三年開始吸引塞外平民，歸附者達120萬<sup>71</sup>。不同種族人士來到長安，有期間性的商業活動，更有長久的文化融合，胡化、漢化同時進行。這一方面流露出唐室對外來文化的尊重；另一方面，唐文化的高度亦為外國人所仰視。彼此來往，達致文化互相影響融合，產生新的結晶物，拼湊出多彩繽紛的大唐盛世。

<sup>67</sup>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4-65列舉胡人在長安設墓誌的文獻記錄，下舉幾例：康志達：終於長安永樂里官舍；安祿山：先居道政坊，玄宗後賜第親仁坊；康阿義屈達幹：卒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

<sup>68</sup>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23

<sup>69</sup>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23

<sup>70</sup> 同上註，及上文「長安城宗教列表」（頁93）

<sup>71</sup>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34